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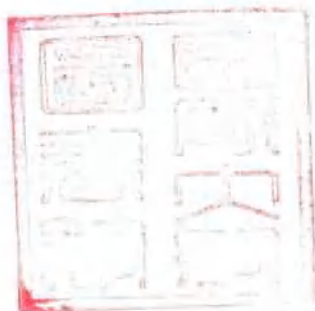


国防大学 2 071 3121 8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1)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宋希濂(12)
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王耀武(27)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杜聿明(34)
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强(38)
广德、泗安的防御战	黄应乾(48)
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	王一民(51)
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	黄应乾(71)
民生公司概况	吴晋航(88)
关于西山会议派的一鳞半爪	周一志(100)
我所知道的陈诚	杜 伟(116)
抗战胜利后海防痛击法军纪实	王理寰(130)

补充和订正

关于金圆券的发行和崩溃	翁文灏(139)
关于英敛之日记扉页上题诗的作者	孙思白(139)
关于币原之死的更正	周一志(140)

附注

对《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

对《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十八辑

对《广德、泗安的防御战》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

对《关于韩复榘统治山东和被捕杀的见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五十二辑

对《刘湘死后川局波澜纪略》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十辑

对《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的补充、订正和质疑见《选辑》第二十三辑、四十八辑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者进一步向华北进攻，爆发了卢沟桥事变。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的某些负责人，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怕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用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在当时大本营得到许多人的同意,就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面屈和企图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畔,并于八月九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的上海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的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日本帝国主义者原来声言三个月就可把中国打垮,谁知在上海一战就打了三个月。它先后由一万左右的兵力逐次增加到二十多万人,使用在上海战场的大炮有三百余门,战车二百余辆,飞机二百余架。不但不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

上海一战,对整个抗日战争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很大的价值。首先,上海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有利于全国总动员;其次,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上海抗战可以扩大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第三,上海是国际观瞻所在,在这里进行坚强的作战,可以正国际间对中国的视听;第四,打乱了敌人的作战计划,争取了主动;第五,上海是我国工商业中心,群众觉悟程度高,群众运动的影响可以振奋全国;第六,可掩护沿海各省工业、物资向远后方撤退。因为有上面这些原因,对上海一战大本营作战组是主张适当地硬拼的。否则叫别人看我国像豆腐一样,就是有心支持我们的人也将丧气而袖手旁观了。

当时上海作战也确是打得有声有色的。群众热烈支持,所有爱国人民都踊跃支援前线。所有江南各省的兵力,都逐渐集中在

上海战场,广东、广西、湖南、四川各省的部队都参加了作战。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除使用在华北战场作战的以外,如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部也都在第一线作战。所有爱国官兵,都前仆后继地发挥了最大的牺牲精神,给了敌人以应有的损失。特别在罗店、大场两个地区的争夺战,表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战斗精神,各国军事观察家都对中国军队的牺牲精神和战斗能力有很高的评价。日本侵略者原来满以为只要三个月就能把中国打败,结束战争。在它这种错误估计之下,就不能不逐次增兵,一再被动。起初,它想以战术包围来包围我上海部队的左侧背,结果演成罗店附近的争夺战而不能成功;后来对大场附近举行中央突破,也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它又不能不大举增兵,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在这种形势下,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作战组组长刘斐曾向蒋建议上海会战应适可而止,及时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移,以便更好地打击敌人和保护自己的战斗力。十月初旬,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对前线各部队向吴福线转移的命令都已下达,前线已开始执行。但在下达转移命令后的第二天下午,蒋介石突然召集一次紧急会议,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九国公约国家正在开会,只要我们在上海能够继续顶下去,九国公约国家可能会出而制裁日本。因此,要收回撤退成命,要各部队仍在原阵地死守。当时,白崇禧、刘斐表示反对,认为既然已下达转移阵地的命令,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在敌人的强大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原阵地,一定会引起混乱,结果将不可收拾。蒋介石坚持不肯,说他可亲自赴前线说服各部队。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赴前线,并要白崇禧和他一道去了。听说他在前线某地(地名记不起了),和一部分的部队长说,九国公约国家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只要再坚决死守一下,战争就可早日结束云云。

这时,第一线各部队,有的正在准备撤退的,忽然又要停止撤退;有的在接到撤退命令后已退却在途的,又要返回原阵地;还有

的已经撤退在途而没有接到返回原阵地的命令的，仍照旧后撤；这自然就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加之战斗激烈，脱离敌人已不容易；已脱离敌人又要返回原阵地去，自然更不容易。这还能有不失败的吗？

这样指挥错乱的结果，原阵地既站不住脚，迨十一月初敌人由杭州湾登陆，进行侧背迂回时，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鹤港之线，结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吴福线既设阵地转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福山、浒浦）进行威胁，只好继续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既设阵地撤退，终于在锡澄线也站不住脚。这种被动撤退的惨局，完全是蒋介石没有战略战术常识，一个劲依赖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没有及时调整战线，争取主动来坚决执行持久抗战方针的结果。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问题，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二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十一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见是：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

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在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认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络线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利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摩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七十八军宋希濂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刘斐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谈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议上又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要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吧!”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甚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后,一面决定迁都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但同时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其中有两投弹在中华门外的飞机场。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陵下边树林荫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

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间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房子里,勾结德国大使陶德曼作投降活动。他一方面对蒋介石建议投降,一方面找作战组探听军事消息。当他晓得前线部队溃退下来的紊乱,乍(浦)嘉(善)吴福线上站不住,乃至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敌人将向南浔压迫,迂回锡澄线的后方,或直驱芜湖截断南京后路等情况时,就乘船去汉口了。

蒋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针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首先把七十八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部序列,并准备调六十六军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山镇、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在防御方针上则已改为固守性防御了。大约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敌人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后来这个部队到十二月八日才在南京煤炭港最后登陆完毕,立即投入火线,到十二日晚又向老家湖北麻城逃跑)。同时传闻汪精卫还是搞了一幕投降活动,听说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到南京去同蒋介石谈过“和平”条件(详情不明)。

三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像煞是有

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十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敌人打退，抢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继续战斗到十二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脱逃。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二千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

附近作战。到下午四时许，俞济时部七十四军又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准备，又经戒严部队请示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至于说到“固守南京”或给予敌人应有的损失，自然更是谈不上。

可是，据说就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唐生智突以征求各部队长意见为名，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也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命令参谋长周斓把油印的突围命令交付各部队长，只说了声“照命令规定的办！”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军掩护长官部直属部队在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其余部队由正面突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自告奋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马上同几个重要人员登车驶向下关渡江去了。听说当他船到江心，守在浦口的第一军挡驾，根据他自己原来的通知不准任何军人渡江，嚷着要开枪射击。经过再三央告，才让他登上了北岸。

当天夜晚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就进入了混乱状态，渡江船只又少，当宋希濂随直属部队第一批渡江后，再把船只放回南岸继续渡江时，只见人人争渡，个个抢先，于是有的船因载重过量沉没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没挤上船的开枪射沉了，连掩护渡江的部队也有许多过不了江。同时长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围，有的部队并没有人到会，也没有接到突围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军团，因战斗中被敌炮把通信线打断了，同长官部失去了联络，用电报同长官部联系又得不到回电，直到当日（十二）夜半才从避难的船夫口中知道下关纷纷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军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许多人淹没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还是比较安全的。如六十六军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没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门出城，经紫金山

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过几次遭遇战，终于经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走了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没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搭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没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失去了官长率领的上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像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至于敌人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姑不在这里说了。

在蒋介石的投机性和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领了南京。国军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退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敌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京过早沦陷是蒋介石一手种下来的恶果。为什么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这样儿戏对待呢？据事后所闻，因当时汪精卫主

“和”，所以他主张固守南京。他认为日本人是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不会真正进攻南京。如果它攻下南京，则战争非长久打下去不可，“和”的文章就做不成了。这是汪的看法。蒋介石呢，他本来没有抗战的决心，不过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不得已才抗战。因此他一味想投机取巧，在上海作战时想依赖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来达成和局；到南京作战，又想依赖汪精卫和陶德曼搞“和”，想以固守来达到“和”的目的。总之是没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战争指导上处处被动。唐生智之主张固守南京，并自告奋勇要与南京共存亡，据事后传闻，也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真正攻南京，或对南京采取攻而不下的政策，以逼蒋为城下之盟，并揣测蒋介石是会接受的。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到日本侵略军拿出真刀真枪进攻时，他就在三十六计之中，马上选择了“走”的上计而溜之大吉。

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利用唐生智死守南京，为他依赖陶德曼和利用汪精卫搞“和”服务的目的就完全落了空。蒋这一气，可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在以后抗战的全期间再也不使用唐生智了。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宋希濂

一 抗战开始蒋介石就无决心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于十七日在江西庐山宣布对日抗战。他对卢沟桥事件的解决，采取了较为强硬的态度；并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虽然这样，是不是可以说蒋介石对于抗日确实具有决心了呢？不，蒋介石在战争的开始就是没有决心的。我写这篇亲历记，是要用铁的事实来证明蒋介石在抗战一开头就是动摇的。

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爆发，一直打到十月底。蒋介石调动了七十三个师参加上海战场的作战，占当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能够指挥的部队三分之一强（当时全国约有一百八十个师）。在这个战场上确实做到了寸土必争，给日本帝国主义以相当大的打击，迫使日军从原有的海军陆战队一个混成旅（约八九千人），陆续增加到十二个师团的兵力。据日本陆军省于十一月初宣布，自八一三至十月底，日军在上海战场死伤四万多人。这个数字可能是大为缩小了的。当时日军在海空军方面占绝对优势，即使依据死伤四万多人来说，也可想见当时战争的激烈程度。所以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日是相当积极的，这是历史事实。但当时国民党政府没有建立后备部队，临时征调兵员，缓不济急。这些新兵又未经过训练，如何能从事这样复杂和激烈的战争呢？参加上海作战的各师，

绝大多数到十月中旬已伤亡甚重,每师所存人数,多的不过三四千人,少的只有二三千人。当时主管作战的军事委员会第一部(以后改称军令部),鉴于已被日军攻占浏河、刘行、江湾、闸北、真如等地,后方又无兵力可以增援,主张迅即将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有计划地撤守福山、常熟、苏州、吴江至嘉善、乍浦之线,以有力的一部占领江阴、无锡至嘉善、海盐之线,从事整补。这两条线是既设阵地,轻重机关枪掩体,星罗棋布,全是钢筋水泥做的,还有许多半永久性的工事。这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约两年半的时期内,派了三十六师、五十七师、八十七师、八十八师等四个师和几个工兵团构筑的。如果及时撤守这两条线,一方面可以节约兵力,使许多部队得到补充和整训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可迟滞日军的前进,以空间换取时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了若干土地,但我们是个大国,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与敌人进行持久战以争取最后的胜利。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蒋介石如果真有抗日的决心,是没有理由拒绝这样做的,但他却把这个计划搁置不理。他于十一月一日晚由苏州乘火车到了南翔附近,同来的有白崇禧、顾祝同等人。随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到南翔附近的一个小学校里开会,除以约半小时的时间听取了几个高级指挥官的战况报告外,蒋介石讲话约四十分钟。他讲话的主要内容分为两部分,而尤侧重于后者。前一部分他概括了八一三以来敌我双方作战的经过和国际间的一般反应,并对前线官兵的英勇斗争作了一些表扬和鼓励。紧接着他就说:“九国公约会议将于十一月五日在比利时首都开会,这次会议对国家的命运关系甚大。我要求你们作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时他又说:“上海是政府的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基地,如果过早放弃,也会使政府的财政和物资受到很大的影响。”蒋介石反复地阐述这番话,语气也很坚定。说完他就走了。

十一月五日晨敌以军舰多艘炮击金山县属金山卫一带,掩护

海军陆战队在漕泾镇、平湖县全公亭及金丝娘桥登陆,同时以敌舰数艘,向海盐城及乍浦岸上炮击。敌军登陆后,分两路进犯,一路由全公亭趋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登陆者在黄埭会合趋张堰镇。六日抵松隐镇,七日占米市渡,八日敌军窜至石湖荡、张庄市,进陷松江。侵占松江之敌,以一部沿沪杭铁路向上海前进,以主力疾趋青浦、南翔,企图将在沪西北区的国民党军队加以包围歼灭。自八一三上海战争一爆发,我就率所部第三十六师(约一万人)投入战斗,在江湾天宝路一带,与敌军周旋了两个多月,无日不战,伤亡逾万。这一期间曾有三个补充团拨给我师补充,有许多士兵姓名尚未登记,便在阵地上牺牲了。当时的战斗确是很激烈而紧张的。十月二十八日,奉令撤到苏州河南岸据守。我的指挥所设在沪西的罗别根路,敌军曾数次施行强渡,均被我击退。至十一月六日,敌又集中优势炮火轰击我阵地,掩护其工兵进行架桥作业,随着敌步兵强渡成功。我军仍在河畔逐点据守,阻其扩大,但战况已益趋严重。因当时所有退守苏州河南岸的部队均伤亡甚大,又无兵力增援。我原归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朱之前任为张治中)指挥,退到苏州河南岸后改归右翼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指挥,他的司令部设在青浦附近。九日下午六时,张发奎和我通电话,说“委员长命令我军务必在沪西再支持几天”。但到八时,张又突来电话,命本师于当晚立即向昆山方面撤退。九日这一夜的退却,简直是紊乱极了。因为自沪西经青浦、南翔至昆山一带地区,全是河汉纵横,没有一处可以徒涉,只有一条公路可走。所有部队全沿着这条公路向西去,大家争先恐后,拥挤不堪。各级指挥官对自己的部队完全失了掌握。自青浦至南翔间的苏州河大桥被敌机炸毁了,所有车辆无路可走,拥塞于途。加以深夜过青浦时,西南方向机关枪声很浓密,说明日军已迫近青浦。大家为避免使自己部队陷于敌军包围圈,更是拼命向前赶,形成极度的纷乱。敌军编组了几个小规模挺进部队,从青浦以西地带挺进到苏州河北岸的南翔至昆山间公路上。胡宗南的第十七军团司令部在南翔西南